

我的国际刑警岁月

◎ 于澄涛 著



The Anecdotes of Interpol

我的国际刑警岁月

The Anecdotes of Interpol

于澄涛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国际刑警岁月 / 于澄涛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653 - 2655 - 4

I. ①我… II. ①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3223 号

我的国际刑警岁月

于澄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1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9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2655 - 4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公安业务分社电话: 010 - 83906108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从北京到里昂

- 3 初识国际刑警
- 6 新来的年轻人
- 9 分析毒情
- 13 情报引导侦查破案
- 16 浪漫的城市
- 19 便衣警察
- 24 情报流水线
- 25 有限的资金
- 27 肯德尔秘书长
- 34 美国同事老马
- 38 法文课
- 40 感动
- 44 省长先生
- 47 较劲



- 50 海洛因的传说
- 53 走进“金三角”
- 58 犯罪数据库
- 62 凶杀案与假护照
- 64 涉案的电话号码
- 66 《百科全书》里的毒品
- 71 “金”字塔下
- 75 诺布尔秘书长
- 79 先驱者的故事
- 80 爱德华·亨利爵士的想法
- 82 阿尔伯特一世国王与第一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 86 铸就辉煌的铜像
- 90 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ICPC）
- 92 维也纳——国际刑警的“古都”
- 96 关于组织性质的辩论
- 97 弗洛伦·卢瓦杰
- 101 让·尼波特

国际刑警在行动

- 107 红色通缉令
- 111 这份通缉令不能撤
- 114 天罗地网

- 118 中国第一张红色通缉令
121 反恐指南
124 相逢在约翰内斯堡
127 欧洲逮捕证
130 承诺不判死刑
135 送别

中国警察——远方的地平线

- 139 国家中心局
144 长安街上的大院
150 港澳回归前的工作会晤
154 哪来的枪？
157 “台湾问题”
159 安德烈·博萨与中国警察
163 国际刑警理论家
167 汤加警察
172 第一次去澳洲
174 神功特警
179 马达加斯加行动
185 老黄牛
189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0 连环案



我的国际刑警岁月

- 194 逃到哪里就追到哪里
- 200 法庭上斗智斗勇
- 207 改名换姓到中国后
- 210 退休前结案
- 213 在喀麦隆
- 217 从罗马到北京
- 220 侨乡祖村
- 222 瞄准亚丁湾
- 224 抓捕与起诉
- 225 该出手时就出手
- 228 盯紧“哈瓦拉”
- 231 海盗在岸上
- 232 合作无止境

从北京到里昂

初识国际刑警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千里迢迢赶到天津就学，成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梦想在学成后能成为一名作家，或是文学翻译家。那时候，我最喜欢去三个地方，一是阶梯教室，二是图书馆，三是运动场。

初秋的一天，在静静的图书阅览室里，一本蓝色封面的书跳入我的眼帘，那是一本中文注释的英文书《INTERPOL 国际警察组织》。书的作者曾慕名前往法国巴黎国际警察组织总秘书处采访，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最终写成此书。

我一口气读完书中精彩的侦探故事，却没有找到中国警察的影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在侦查破案、打击犯罪的领域还未与世界接轨。

我将书放回书架，但记住了“INTERPOL”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如此之巧。30多年后的今天，我写下了下面这一段中国与国际刑警的故事。因为我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国际刑警。

30多年前，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大学生都被视为稀有人才。他们不必外出奔波，更不必自谋生路，国家会分配工作。只要成绩尚可，人品不错，在校园里好好读书，就能等到一个就业的机会，毕业后一头扎进社会即可。





校园是梦想的乐园。临近毕业，学生们的各种梦想漫天飞舞。我当时沉迷于文学，在南开“五四”征文中翻译了惠特曼的诗，居然获得了奖。于是我更希望能去做翻译，做一名纯粹的文学工作者。

于是，我几乎每天都在甜蜜的“梦”中听课。

一天，下课铃声响过，杨老师站在教室门口叫我，然后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杨老师是外文系的学生辅导员，我们都称呼他老杨。

在老杨的办公室里，两个陌生人站起来和我握手。他们身着灰色中山装，表情庄重，又很和蔼。互相介绍后便家长里短地聊起来，其中一位笑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英文杂志《新闻周刊》让我读一段听听，然后又让我讲讲文章的内容。

那时候的人大概都这么含蓄，连用人单位面试都不肯明说。

但我很快就知道了，那两位男子都是公安人员。

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公安人员都是在派出所、刑警队工作，破案、抓小偷……学外语的大学生，公安部门需要吗？

老杨郑重地向我证实，那两位公安人员就是来南开大学选人到公安部工作的。老杨说：“国家要派人到纽约的联合国警察组织去。”又说，“我看你符合条件，就准备去吧。”

1983年的夏天，真的从北京传来了消息，通知我去公安部报到。我一下子充满了神圣感，但恍然之间又有些不知所措。“还搞文学吗？”一位同学高兴地拍了我一下，“别做梦了，迎接新生活吧。”

于是，我背起行囊，告别南开校园，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一份内部材料上，我看到了英法两种文字的“国际刑警组织”，即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 ICPO /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olice Criminelle - OIPC。它的地址不是联合国，也

不在纽约，而是在巴黎。那时中国不是成员国，正在筹备加入中。

“把申请书修改稿誊清”“这份材料尽快翻译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地接到领导这样的指示。我一遍又一遍地誊写申请书的审批稿，一篇又一篇地翻译介绍这个组织的外文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有关的法律规定……我逐渐明白，每个国家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活动中，都需要别的国家配合。警察要出境执法、抓捕犯罪嫌疑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等，都需要国际刑警组织帮忙协调。

1983年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涉外案件在飞快地增多，要找到一个打击犯罪、维持治安的国际合作渠道，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算是最好的选择。

一年后，日历翻到了1984年9月，国际刑警组织要在卢森堡召开第53届全体大会，中国代表团准备前去递交加入组织的申请书。

卢森堡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漫无边际地想象着，刘文局长走进来，说：“你就别去了，留在北京，配合前方工作，整理报回的工作情况。”

他那老辣的目光似乎在说：“你刚毕业，去国外工作，还嫩了点儿。”

人类的生活五光十色，大千世界悄然发生着变化，而每次巨变都始于转瞬即逝的机遇。1984年的这一次机遇，中国警察绝对不能错过。那时候，国人对投票表决还十分陌生，但正是这陌生的投票机制，把中国警察迎进了国际刑警组织。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推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新来的年轻人

自从穿上警服那天起，国际刑警组织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围着这块磁铁转了14年，我才如愿以偿地走进国际刑警组织的大门，成为中国进入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的第一位国际刑警。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能到国际组织去工作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作为中国公安部派驻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的首位警官，我第一次一个人背井离乡，肩负着开拓局面的重任，走出国门，很有使命感和压力感。

我乘坐飞机抵达法国里昂机场时，正值初冬时节。郑德华先生去机场接我。进城的路上一眼是广袤的田野，田地里是庄稼收获后留下的深棕色的圆柱形草捆，灰白的残雪斑驳陆离，向远方铺开去。寒风吹过，一片肃杀。这景象让我从长途飞行的困顿中猛醒过来。

当晚，我在城里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我在日记中写下了抵达法国后的第一个感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3亿人口，190多万名警察，中国可以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坚力量。”国际刑警组织的领导人当时就有了这样的宏观视野。

当我出现在夏尔·戴高乐码头200号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办公大楼的时候，里面的人都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其实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已有多位香港警官在这里轮流工作了多年，郑德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俩在北京和香港都曾合作过，彼此已很熟悉。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但郑先生的警徽上印着“皇

家香港警察”的字样，代表英国警方。当1997年香港回归的脚步逐渐走近的时候，香港的警官们似乎意识到，他们在国际刑警组织中的角色将发生些微妙的变化；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与中国大陆警方朋友的工作关系未来会更加密切。

在总秘书处的人事部门报到后，我领到了一本《员工纪律和工作守则》。我按照程序在忠于职守的文件上签了名。留着小胡子的人事负责人严肃地告诉我：“今后，你就是这个组织的官员。你的言行代表着这个组织的形象。工作中要自觉、自立，要对我们的组织负责。”

那阵势让我感到有些异样。当年我走进公安部的大门时，可没有经历过这样严肃的程序。即使后来在“镰刀斧头”的党旗前举过拳头宣过誓，但也没有签过名。

我从头至尾看完《员工纪律和工作守则》后，出了一头汗，因为上面说，在总部工作，我不能代表中国警方。“不代表中国警方”，那该如何处理中国警方的对外合作呢？我陷入了深深的疑虑之中……

后来，我经常代表总秘书处出差办事，甚至以这种身份回北京组织国际会议，时间久了便习以为常了。每次出差前，人事部都给我一份文件，注明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代表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到某地参加某项活动，请途经各国的边防和外交部门提供便利。

那时候中国公安部常要求我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此时要按要求履行请示和审批手续。人事部会在一份文件上写明，我在某一段时间参加中国代表团活动，在此期间内不行使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的职权。总秘书处的部门负责人虽不情愿放我去，却也无可奈何。

在这两种身份之间转换久了，我也就不再感到别扭了。



总秘书处把我安排到刑事情报处的缉毒科，去协调涉及海洛因的贩毒案件。缉毒科的负责人名叫潘伊安，一位在总秘书处干了十多年的澳大利亚警官，当时已经 50 多岁，细高个，留着两撇灰白的胡子，说话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很绅士的样子。

我和他在北京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就已相识。他见我独自一人闯荡里昂，一腔热情、跃跃欲试，便常用赞许的目光看我。但后来他对我说，不该长时间和家人分开，应当把家属接到里昂来，家庭生活安置好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安心工作。老潘的话让我感到很温暖，出国前可没人跟我说过这事儿，自己想到了也难以启齿。能到国外工作，已是组织的高度信任，哪还好意思提出家属随行。

我出国前的行政级别是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而老潘他们在国内的行政级别并不比我高，却都成了我的领导。他大概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又一次在饭桌上告诉我，在国际环境里工作，要忘掉国内的行政级别，忘掉以前在国内的工作方式，一切要从头开始。要学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争取和大家打成一片，协作、配合，否则是很难适应环境的。

经过老潘不断地点拨，我慢慢地适应并融入了这个和国内不太一样的工作环境。

刑事情报处的工作是收集整理犯罪情报，搞犯罪分析，发布红色通缉令和各种犯罪情况通报。有时候也协调办案，帮助各国提高协作效率。

缉毒科在刑事情报处是人数最多的单位。我在这个单位里属于年轻人，老潘便给我安排各种锻炼的机会。他让我分析研究涉及海洛因的犯罪情报，给各国提供执法建议，还让我编写全球海洛因情况报告，协调跨国缉毒行动。因为我是亚洲人，在协调案件工作中老潘让我重点联系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

我那时年轻力壮，不知疲劳，一门心思地想在总秘书处学到新东西、干出点名堂来，同时又想协助中国公安搞好国际业务。所以，虽然身在缉毒科，但有组织犯罪、人口走私、抢劫、非法移民、侵害妇女儿童犯罪、经济犯罪、文物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执法、“洗钱”、通缉通报等各种业务，似乎也都成了我需要兼顾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联合国的观察员组织，与世界海关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银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等专业国际组织也展开了密切合作。在如此广泛的国际视野里，我感到自己就好像一块铁矿石被投入了总秘书处这座大熔炉里，我开始锻炼意志、丰富思想，享受那种快乐而充实的感觉。

分析毒情

1997年，欧洲的海关和警察在多个国际机场都查获了大量海洛因。秘书长肯德尔指示我们观察动向、掌握资料。潘伊安召集大家开会落实秘书长指示，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就全面情况进行一次摸底分析。国际贩毒浪潮持续不断地冲击着欧洲大陆，一种毒品案件的数量减少了，其他毒品很快就会取而代之。

当时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持续高产，海洛因开始从西南亚大量涌入欧洲，这让欧洲缉毒执法部门忧心忡忡。那时国际机场接二连三地查获多起大案，这仅仅是巧合，还是刚好验证了他们的担忧？

老潘看着我，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要了解欧洲机场当年查获海洛因的总体情况，需要浏览一下国际刑警的犯罪数据库。我先作一个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吧。”

他点了点头，让秘书通知数据库管理员协助提供材料。

我回到办公室，放下手中的文件，就盯着墙上那张五彩斑斓的欧洲地图琢磨起来。那些不规则形状的国家大大小小，似乎变成了一双双眼睛，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那些眼睛都在期待着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拿出一个正确答案来。但要想拿出数据，需要对缴获毒品的数量和特点做出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总秘书处的数据库虽然不算强大，但欧洲各国向来认真输送缉毒案件资料，因此要了解欧洲国家的毒情，还是可以据此找到相对可靠的依据的。

在数据管理员的协助下，我找到了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案件。几天后，一份简要的案情分析报告便放到了潘伊安的桌上。

我在这份报告中援引缉毒数据，阐述了这样一些观点：一是虽然欧洲各大机场查获海洛因的案件和数量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减少，但欧洲大陆总体上查获海洛因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而且呈上升的趋势。二是在海洛因查获量减少的各大机场，可卡因查获量却上升了。1996年欧洲全年查获可卡因总量为31吨，仅在机场就查获7.5吨。

从这种情况来看，欧洲的海洛因和可卡因贩运情况一样很严重，只是贩运路线和手法变了。原来的空中贩毒受到了欧洲警察和海关的查缉，现在已转向公路和海上贩毒，但是严格查控了卡车运毒，贩毒分子还会开发新的贩运方式。

这份报告印证了欧洲国家缉毒执法部门的担心，告诉各国堵源截流依然是防止毒品贩运的重要手段。

潘伊安读完这份《欧洲各大机场查获海洛因情况报告》后，决定将它放到国际刑警组织内部刊物《缉毒周报》上。到任后第一次得到上级认可，我感到挺爽。